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瓮、余、湄剿匪作战

李德生



▲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

史事经纬

1950年6月21日至7月10日，解放军贵州军区剿匪部队东集团指挥部，遵照西南军区首长的指示和贵州军区领导的统一部署，发起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大合围”，经过20天的作战，一举消灭盘踞在该地区王福堂匪部，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解放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在贵州开展剿匪作战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贵州，迅捷解放了贵州全境。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失败，在逃离贵州之前，按照其“应变计划”，培训了一批特务，并向他们散发大量武器弹药，携带多部电台潜伏在贵州各地，阴谋“东山再起”。

1950年初，解放军主力奉命入川、滇作战，贵州反动势力乘机纠集土匪、溃兵，在全省多处举行武装暴乱，他们大肆抢劫群众财物，任意杀人放火，企图夺回已失去的政权。

为巩固新生政权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主力，在完成入川、滇作战任务后，派出部队分别由川、滇回师贵州。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部署，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贵州军区领导下，从1950年春季开始，贵州解放军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为了肃清匪患，贵州省委、省军区，以解放军第十六军为主，专门集中一部分机动部队，组成东、西两个剿匪集团，在军区直接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实行“有重点的剿匪斗争”。在军事进剿全面展开前，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军区连续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要求参战各部队“进剿一地，净化一地”，同时要求进剿部队认真执行“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的方针，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发动各地群众，积极投入到剿匪战斗中来。

3月23日，公安部门组织对贵阳市实施大搜捕，查获国民党潜伏特务249人，摧毁了匪特的指挥机关，切断了特务、土匪之间的联系，粉碎了匪特妄图“里应外合，攻陷贵阳”的迷梦。

解放军在黔东瓮安、余庆、湄潭地区发起“铁壁大合围”战役

解放军剿匪部队以营为单位进行出击。经过一个多月的追歼、进剿，到5月底，歼灭了土匪的多支有生力量，并逐渐恢复了公路沿线的村镇，迫使大部分残匪龟缩于各县接合部的山区。

至此，对土匪实行大规模合围进剿的时机已经成熟。1950年6月21

日至7月10日，贵州军区剿匪部队东集团指挥部，遵照西南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 and 贵州军区领导的统一部署，集中一三六团、一三八团、遵义随校、一四〇团、一四八团、一五〇团大部分兵力，组成合围进剿部队，在黔东瓮安、余庆、湄潭地区发起“铁壁大合围”战役，其主要目标是全歼危害最烈、政治影响极坏、又有较好装备的土匪王福堂部。

土匪头子王福堂原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副营长，在淮海战役中曾被解放军俘获，后乘隙潜逃，逃到贵州，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11月，这家伙迫于形势，随部队起义。在接受整训期间，此人本性不改，不久便再次叛变为匪，被国民党特务封为“三九二部队野战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1950年初，他带着一群土匪、国民党溃兵、特务，流窜在瓮安、余庆以北，湄潭以南的袋形地区，杀人放火，袭击单独行动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及进步群众，气焰极为嚣张。

6月中旬开始，随着解放军贵州军区前敌指挥部下达《作战命令》，剿匪各部队从四面八方进击瓮、余、湄地区，完全形成了拉网式大合围的态势。各部队就地宿营，在凡一切土匪有可能逃走的地方，都布上了明岗暗哨。整个合围区域，漫山遍野燃起烽火，火把，红、白、绿各色信号弹不时在天空中闪烁。

6月22日拂晓，按照统一部署，各部队吹响了冲锋号角，哨子、牛角、竹筒、军号声、“缴枪不杀”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当解放军一三八团分兵80余路自东向西拉网前进时，躲在八龙山上的王福堂土匪惊慌失措，稍稍抵抗后便慌忙逃走。逃跑途中，土匪们不断遭到解放军搜剿部队的围追堵截，死伤惨重，其携带的重武器也被丢弃在路旁。

王福堂带着匪徒向西北方向一路狂奔多时，自以为逃出解放军进剿部队的包围圈时，突然发现西北天空也

升起了解放军的各色信号弹。王福堂自知不敌，慌忙命令土匪们由大股活动分散成小股流窜，自己只带1个连的亲信逃走。

军民共筑天罗地网

王福堂在逃窜途中，发现当地到处都是解放军的进剿部队，于是又慌忙遣散了大部分亲信，然后和几个随身保镖取出此前在解放军中接受整训时偷来的几套军装换上，也吹起哨子、牛角，企图冒充解放军搜剿部队战士混出哨卡。他们哪里知道，解放军搜剿部队早有防范，当他们企图混出哨卡时，被解放军战士识破，又被击毙、活捉数人。王福堂只得带着几个残匪回到包围圈内，继续东躲西藏。

为了抓住匪首王福堂，解放军各路搜剿部队不分昼夜地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并根据上级指示，在重点地域驻扎部队，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身兼战斗员、工作员、宣传员的职责，在战斗的间隙中，他们大力向群众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种田、收谷、砍柴、挑水，并迅速帮助群众组建起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初步把瓮、余、湄3县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就这样，在整个合围地区，解放军剿匪部队和人民群众共同形成了天罗地网。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掀起了群众性的搜匪、捕匪、劝匪投降的热潮，土匪们无处遁形，除被击毙、活捉外，大部分走出藏身地缴枪投降。很快，瓮安、余庆、湄潭3县接合部的土匪基本肃清。

智擒匪首

在大部队搜剿的同时，解放军还派出精锐侦察员，组成多支剿匪小分队，四处搜山、兜捕溃散匪众。他们时而装扮成农民，时而装扮成商人，有时又装扮成“土匪”，活动在土匪经常出没的

地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残匪，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一天，一四〇团便衣班接到群众举报后，化装来到中坪，发现一个土匪正在来回走动着站岗放哨，便衣班派出一名侦察员主动接近匪哨兵，用当地方言上前和他搭讪。这个土匪哨兵以为侦察员是另一股土匪中的一员，放松了警惕，很快就被侦察员活捉。据被俘土匪交代，他还有16个同伙躲在不远处。小分队命令他带路，很快赶到这伙土匪的藏身处，将他们一举擒获，经审讯，小分队从俘虏们口中得知了匪首王福堂的大致活动范围，并将该情况迅速转告了其他小分队。

一三八团八连指战员组成的9人小分队了解到匪首王福堂的去向后，立即化装出发，前往搜索。当小分队来到老西沟附近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便立即上前，主动介绍是来寻找王福堂汇合的土匪。对方信以为真，供认出“王团长在山岩下陈家住着”。小分队9人立即分成3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把陈家包围起来。

小分队指战员进入陈家中时，发现陈某夫妇正在吃午饭。指战员立即盘问陈某，是否有人在他家“做客”，陈某夫妇矢口否认。

小分队指战员见桌子上摆着3个碗、3双筷子，且放在桌上的那个碗里还盛着热气腾腾的半碗饭，于是突然问道：“你家几口人？”陈回答：“就我们两口。”

小分队指战员听后，立即对屋内院外进行仔细搜查，很快在牛棚牛屎堆中发现了一个人。经外貌特征比对，确认为匪首王福堂。

至此，历时20天的瓮、余、湄铁壁大合围作战胜利结束。此次战役，解放军剿匪部队共毙伤、俘虏土匪3172人，缴获各类枪支1621支，机枪48挺、子弹3.4万余发、小炮11门、炮弹10发，追回被土匪劫掠的公粮20余万斤。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红色足迹

靖西和平起义中的赖慧鹏

秦芸

1947年冬和1948年春，爱国民主人士赖慧鹏两次秘密赴香港会见李济深，并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组织。李济深要赖回到广西后，“设法找个有力量的工作做”，“在解放军逼近广西时予以配合”。赖慧鹏回广西后于1948年8月出任国民党广西靖西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积极联络进步人士，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经过一系列准备，起义条件日益成熟。此时，国民党当局发现赖慧鹏可能有“异动”，便派出“督导团”到靖西，威逼赖慧鹏出兵“进剿”中共游击队，赖慧鹏对此不予理睬；并以保卫邕龙公路为由，将辖区内国民党顽固派的部队调走，减轻了对起义的威胁。12月5日百色解放，国民党黔桂边绥靖区司令部命令赖慧鹏协助国民党残部逃亡越南，赖慧鹏以“共军部队布满边境”为由，阻止了敌人逃往越南的企图。

百色解放后，国民党百色行政专区督察专员陈汉流带着100多人携枪进入靖西，赖慧鹏立即派部队强令陈部缴械，并对陈进行了说服工作。陈听后表示愿意带领部下参加起义。接着，赖慧鹏又派部队扣押了“督导团”，为和平起义扫除障碍。

12日，赖慧鹏召集决定参加起

义的当地军政首脑和进步人士开会。会议研究决定于13日宣布起义。大家决定成立“桂西南和平解放运动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还就起义通电、起义宣言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并在起义宣言上签了字。会后，靖西各机关、团体、学校的职员、师生和居民，根据“桂西南和平解放运动委员会”的通知，纷纷走上街头，把所有反动标语刷掉，写上新标语“欢迎中国共产党来解放靖西”“拥护和平解放”。

12月13日上午，在靖西中山公园广场召开了起义大会，到会各界民众万余人。大会升起了五星红旗。赖慧鹏主持大会，宣布靖西专区（还有百色专署部分人员和田东县）自即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会上，宣读了给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起义通电，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通电和桂西南和平解放运动委员会的《起义宣言》。

起义大会后，赖慧鹏派人与解放军、游击队联络，汇报靖西和平起义的情况，同时请求速派部队前往接管。其间，赖慧鹏等还领导起义部队对企图通过靖西逃往越南的国民党军进行阻击，并说服部分国民党官兵起义，接受解放军改编。

1950年1月，解放军到达靖西，赖慧鹏率各界列队迎接。

闽粤赣边区纵队以胜利为新中国献礼

常红

194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建立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1949年1月29日，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召开庆祝闽粤赣边区纵队的成立大会，宣布中央军委命令。闽粤赣边区纵队成立后，在人民群众支援下，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先后解放了粤东潮梅和闽西南的大片地区，部队发展到4万余人。

1949年9月，为迎接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解放广东，闽粤赣边区纵队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对盘踞在松口、畲坑的敌人发动攻势。

9月21日晚，边纵参战部队从梅县白渡急行军到达松口，追敌至丙村，于23日将敌人消灭。

据侦察，畲坑之敌为国民党胡璉兵团第十八师的一个加强营，此外，在畲坑附近的水口和径心两地还各驻有敌人一个营。闽粤赣边区纵队根据这三股敌军的情况，决定了“三步走”作战计划：第一步，以纵队直属第七团牵制径心、水口之敌，以纵队直属第一团主要兵力在第一支队第二团的协同下歼灭畲坑之敌；第二步，由第一支队第二团牵制并切断水口与径心之敌之间的联系，以纵队直属第一、第七团歼

灭径心之敌；第三步，纵队直属第一、第七团转移兵力协同第一支队第二团围歼水口之敌。

10月1日晨，边纵直属第一团按计划从东西两个方向向畲坑南部的石湖咀之敌发起攻击，一举攻占了敌人在公路两侧的阵地。石湖咀守敌依托村后高地继续顽抗，并发动几次反扑，均被击退。战斗相持至下午2时，从径心方向赶来的援敌进至石湖咀南面的榕树下附近，遭到纵队直属第一团第三连和第七团第四连的阻击，被消灭一个排后仓皇逃走。石湖咀之敌得到援敌赶来的消息后，也以机枪、榴弹炮掩护再次对边区纵队进行反扑，企图与援敌汇合。纵队领导立即命令直属第一团派出第二连抄敌侧后，经过激战，不仅再次击退了敌人的反扑，还乘胜尾追逃敌冲入石湖咀，将守敌歼灭。畲坑守敌不敢抵抗，丢下阵地和重武器，企图涉水越过梅江逃命。边纵战士追到江边，击毙了抵抗的敌人，并将尚未渡江的敌人全部俘虏。

战斗于下午6时结束。此次战斗，闽粤赣边区纵队共毙、伤、俘虏副营长以下150多人，缴获各种枪炮弹药及大批军用物资，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为新中国的成立献礼。

“为第一面五星红旗增光”

谢坤

孟庆印于1945年10月参加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他机智勇敢，屡立战功——1947年2月，在三保临江战役中，孟庆印和战友一举攻克八九六高地，荣立大功1次；1947年夏季攻势中，孟庆印负伤不下火线，立下战功，荣升为副排长；1948年9月，辽沈战役期间，孟庆印率全排战士奋勇突破敌城防工事，占领敌山炮阵地，缴获山炮2门，俘敌35人，并率队攻破敌核心阵地大佛寺，战后，孟庆印荣立特等功1次，被上级授予“尖刀英雄”光荣称号，所带二排被命名为“尖刀英雄排”。

解放军四野部队于1949年9月13日发起了“消灭白匪军，向新中国献礼”的衡宝战役。孟庆印所在部队和兄弟部队共同将国民党军白崇禧残部堵截在杨家桥、铁塘桥一带，并抢占了杨家桥以北的腊冲山和兴隆山等制高点。

敌人害怕被歼，于10月9日集中5个团的兵力向二八〇高地阵地发起疯狂进攻，企图从这里突围。

危急关头，担任团预备队的三连二排，接到迅速夺回二八〇高地的命令。在炮火的掩护下，三连副连长和

排长孟庆印带领着二排，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发起猛攻，不到30分钟，就从敌军手中夺回高地南端阵地，歼敌一个班，并连续打退敌人的4次反扑。乘守敌混乱之际，孟庆印指挥全排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出其不意攻上山头，夺回了二八〇高地全部阵地。

10月10日上午，敌人集中兵力，对二八〇高地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孟庆印和战友们坚守阵地，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大批敌人。战斗中，解放军阵地上一挺机枪被打坏，敌人乘机冲进阵地，孟庆印迅速率一个战斗组赶了过来，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孟庆印手端上了刺刀的步枪，率领战士们和敌人奋勇拼杀，不仅消灭了冲入阵地的敌人，并把后续敌人一个连的兵力打下山头，随后又两次打退敌人一个营的进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就在战斗即将结束时，孟庆印不幸腹部中弹。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以惊人的毅力，将手中的手榴弹一颗又一颗地投向敌群，直到倒在血泊之中。

战后，四十军为孟庆印追记一等功，为二排记集体两次大功，并授予“孟庆印排”的光荣称号，赠给“攻得勇猛，守得顽强，兴隆山上再放光芒”的锦旗一面。

重庆解放前夕

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人的护厂斗争

陈宇

史海观澜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奉上级指示，全力开展迎接解放、保护城市的工作。当时，位于重庆江北区的第二十一兵工厂，是旧中国最大的轻武器制造工厂，主要生产轻、重机关枪和迫击炮弹。中共重庆地下组织负责人卢光特通过第二十一兵工厂的地下党员赖宗瑜与该厂厂长俞濯之取得联系，形成了一个护厂核心团队，领导工人们严密设防，为接下来的斗争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随着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实施炸毁兵工厂的罪恶计划。11月28日，国民党反动军警强行进入第二十一兵工厂，用枪口和刺刀对准进出车间的职工，并将大批

装有炸药的木箱堆放在厂内。得知情况有变，俞濯之立即设法摆脱敌人的软禁，赶到厂内，叮嘱工人们加强戒备。工人们立即筑成三重“人墙”，从厂大门口起，层层守护，绝不允许匪特进厂接近放置炸药的地区，许多职工家属也主动加入到了护厂的行列。

1949年11月29日，国民党当局给军警特务下达了爆破指令。当夜，国民党军警特务杀害护厂工人，强行冲入第二十一兵工厂的石罗汉新发电所和大桥火药库引爆炸药，巨大的爆炸将附近大片民房夷为废墟，群众被炸死很多人，驻扎在附近的国民党残兵败将100多人和来不及撤走的爆破队员也全部被炸飞。

得到消息的护厂工人立即加强了防卫，使敌人爆破队无法闯入。随着解放军进军重庆的密集炮火声

越来越近，爆破队很快便一哄而散。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紧急召开护厂会议，成立以共产党员为领导的“职工护厂联谊会”，迎着冲天的爆炸声，活动在厂区各地，防止敌人的进一步破坏，组织实施灭火防盗救护等工作。

11月30日上午，为保护工厂安全，防止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捣乱破坏，工人们换穿工作服，继续站岗放哨，使厂区安全得到了进一步保证。国民党军警特务又企图将厂中的数艘交通轮船沉，船工们与敌人进行了斗争，将交通轮抛锚于江心，并通宵守护。几天后，这几艘轮船就成了运载解放军渡江追歼逃敌的江上飞舟。

厂区虽然完整保存下来，但还到处堆放着国民党爆破队设置的炸药箱，险情尚未排除。俞濯之下令从速处理掉这些隐患。护厂核心团队经过商量认为，

险情必须尽快排除。考虑再三，认为只有将炸药箱投入嘉陵江中比较稳妥。并指示由步枪厂主任董德才牵头组织搬运炸药。董德才立即在雨花村召开职工大会，动员大家将炸药扔进嘉陵江。吴坤山老师傅听后第一个站了出来：“我来搬第一箱。”说罢，他毅然第一个走向了炸药堆，老工人朱永贵和刘相臣也随后走进了厂房。

吴师傅走到炸药箱前，抱起一箱重20多公斤的炸药箱转过身来，向外走去。朱永贵、刘相臣等人随后动手。大家被这几位老师傅勇于牺牲保厂的高尚情操感动，一齐上前，搬的搬、抬的抬，不到两个小时，步枪所的147箱炸药全部被清除出厂，放入木船后将木船推入江心，把炸药箱投入江水中。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其他厂区，各处工人立即把600多箱炸药全部搬出厂区，沉入嘉陵江江底。

在厂区的另一些地方，特务们没来得及埋设炸药，于是就用石块和泥土堆起了许多突出在地表面的土包，并造谣说这些是地雷，企图以此恐吓工人不敢进入。吴坤山得知后立即前往，并主动上前检查，证明这些土堆里根本没有什么地雷。

30日当日，工厂立即着手恢复生产，迎接解放。